



徐以新： 用脚步丈量一段共和国历史



徐以新陈列馆

都说山路十八弯,在过去,人们要从岭洋到衢州,要跨越好几个县区——从遂昌到江山,从江山到衢江……而在90年前的冬夜,有这样一名15岁的少年,抱着满腔的革命热忱,光着脚在这条山路上走了整整四天,一路走到了建德参军……这个与中华民国同一年诞生的少年,就是后来著名的“二十八个布劳尔什维克”中的“半个”,也是新中国外交战线上积极的开拓者和和平使者徐以新。

岭洋乡老一辈革命家徐以新等也长眠于库区的青山翠柏之中,红色记忆、薪火相传。在岭头读完小学后,1924年,徐以新在浙江省立第八中学校(现浙江省衢州第一中学)读书时,课余时间,他常帮助老师抄写文稿,张贴宣传标语,练就了一手写写画画的基本功。1926年12月,北伐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胜利进驻衢州城,决心参军的徐以新却被以“个子不高,看起来像个小鬼头”为由拒在了参军的大门之外。但他没有气馁,3天后,徐以新便瞒着家人,怀揣一块银元,一路追赶北伐军而去。北伐军的长官看到徐以新参军热情高,人机灵,能吃苦,所以在1927年1月,正式批准他入伍。由于徐以新在学校做过宣传工作,后来便担任了北伐军第二十六军第二师宣传科见习官。在部队里,徐以新如鱼得水,他每天写稿、写标语、画宣传画,还曾在周恩来、贺龙等同志身边工作过,并参加了上海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。

在不能攀越的群山之间,是河流最先开凿出道路。正是凭借着这一股流水般的韧劲,徐以新开始了他漫长的革命征程——1930年,徐以新在苏联留学时转为中共党员;1931年春,他学

成回国,任共青团沪中区委书记。同年11月,赴鄂豫皖苏区工作,先后担任四方面军政治部主任、军委参谋主任、省委常委、苏区外交委员会主任等职。1932年,随红四方面军撤离苏区,向川陕进军,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主任、军委秘书长、川陕省委委员。后以红四方面军全权代表身份,与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的全权代表孙蔚如进行谈判,达成了秘密协议,为四面受敌的红四方面军开辟了一条红色交通线。这期间,他曾两过雪山、三过草地,参加筹建鲁迅艺术学院,参加延安整风和解放战争……新中国成立后,徐以新调入外交部工作,任苏联东欧司副司长、司长等职。1952年,徐以新作为顾问随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,参加了周总理同斯大林的多次会谈。1954年9月,周恩来总理亲自指派他担任驻阿尔巴尼亚首任大使。此后,徐以新先后出任过驻挪威、叙利亚和巴基斯坦大使。1966年1月,他出任外交部副部长……

1993年10月,82岁高龄的徐以新回到阔别六十多年的故乡,并重返自己的母校衢州一中参观。1994年12月30日,徐以新在北京溘然长逝,他的部分骨灰撒在家乡抱珠垄村的土地上。次年3月,中共衢县县委、县政府在抱珠垄村建立了“徐以新纪念碑”。如今,从岭洋乡政府出发,沿着光滑发亮的鹅卵石路走上几百米,翻过一段小山坡,便能遥遥望见那座隐于群山之间的纪念碑。青山不语,当跫音叩响古老的石径,便仿佛能穿越近一个世纪的时光,随徐以新一同用脚步丈量出那一段风起云涌的历史。

来源:衢州日报



左起:徐以新、聂荣臻、李强



1945年,参加中共七大的三位代表在延安合影。左起:徐以新、蔡畅、陈赓

悼念徐以新同志

徐以新(原名徐一新)是浙江衢州人,生于1911年,中学时代就受革命思想的影响,投身革命。1927年在武汉经陈康同志介绍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,1930年在苏联留学时转为共产党员。以新同志为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近70年,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。

在革命的征途上他投奔北伐军,参加过上海工人武装起义和南昌起义,在周恩来、贺龙等同志身边工作过。1931年以新同志从苏联学成回国,被派往鄂豫皖苏区,先后担任省委常委、军事部长、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参谋主任、政治部副主任等职。后以红四方面军全权代表身份,于1933年5月至7月与西北军杨虎城将军的全权代表孙蔚如进行谈判,达成了秘密协议,为四面受围的红四方面军开辟了一条红色交通线。

1933年8月,因反对张国焘分裂党的路线,以新同志被张国焘逮捕关押。他跟随部队三过草地,两过雪山,直到1936年10月三个方面军大会师后才获得自由。在与张国焘错误路线的斗争中,他表现出一个共产党员所具有的坚持真理、刚直不阿的无产阶级革命气概。

在延安期间,他于1938年初参加筹建鲁迅艺术学院,并任政治部主任。他在抗大、鲁艺、陕公、女大等学校讲授《社会主义概论》等课程,很多老干部都听过他讲的课。1943年任中央直属党委书记兼中央管理局政治部主任。1944年当选为党的七大代表。解放战争期间,毛主席特地叮嘱他最好能到县一级基层锻炼,在东北他担任过合江省依兰县委书记、佳木斯市委书记。1948年11月徐以新同志被调回部队任沈阳军区政治部主任。

新中国成立后,以新同志于1950年5月调入外交部,任苏联东欧司副司长、司长等职。1952年作为顾问随周恩来总理访问苏联,参加了总理同斯大林的多次会谈。他因认真负责、兢兢业业工作,受到了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表扬。1954年周总理亲自指派徐以新同志出任驻阿尔巴尼亚首任大使。行前,毛主席特地接见了以新大使夫妇。此后,以新同志出任过驻挪威大使、叙利亚大使,80年代任驻巴基斯坦大使。

在任驻外大使期间,他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我国外交路线和方针,积极开展对外活动,努力做好上层人士的工作,为增进两国政府、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,扩大同驻在国政治、经济、文化科技等领域的合作,取得了显著成绩。有几个国家在他离任时为他授勋,以表彰他为促进双方友好合作关系的发展所做出的贡献。他十分重视调研工作,密切跟踪国际形势、地区形势和驻在国形势的发展与变化,经常提出建议,供国内决策参考。

1966年以后,以新同志任外交部副部长。他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外交政策方针,多次参加接待来华访问的重要外宾,处理了大量的内部事务和涉外案件。正在需要他发挥作用的时候,碰上了那个特殊年代,由于所谓的“历史问题”,他受冲击长达11年之久。以新同志识大体,顾大局,忍辱负重,无所畏惧,表现出了一名共产党员的高尚品质。

1983年至1993年,以新同志担任全国政协常委,他积极开展人民外交。他拥护党的改革开放政策,积极参加经济组的活动,多次担任政协赴各地考察团团长,做了大量调查研究工作。他认真参政议政,关心祖国统一大业,为巩固和扩大爱国统一战线,维护和巩固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的各民族团结,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了不懈的努力。

以新同志在近70年的革命生涯中,始终不渝地忠于党,忠于人民,忠于共产主义事业。无论是艰苦的对敌斗争中,还是受到党内机会主义分子的迫害以及“文化大革命”的冲击,他都英勇斗争,坚贞不屈,正气凛然,刚正不阿。他党性强,顾大局,识大体,处处把党和人民的利益放在首位,一切服从组织安排,严格遵守组织纪律,不居功自傲,不计较个人得失,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。他衷心拥护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、方针政策,在政治上、思想上、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,遇到风浪决不动摇。他有高度的革命事业心和责任感,工作一贯认真负责,实事求是,兢兢业业,任劳任怨,为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,为新中国的外交事业,竭尽心力,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全部智慧和毕生精力。他生活俭朴,待人诚恳,关心干部成长,体察群众疾苦,关心和爱护同志,始终保持着老红军艰苦朴素的优良传统,保持着廉洁奉公的人民公仆的本色。

以新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,光辉的一生,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。

对于他的逝世,我们深感悲痛。他那崇高的革命品德、优良的革命作风和无私的奉献精神永远留在我们心中。

原外交部部长 钱其琛



徐以新陈列馆

“父亲教导要始终把人民群众放在心头”

——专访外交部原副部长徐以新之子陆放

“我父亲就是这大山里的一个娃,他没有给父老乡亲们丢脸,始终把人民群众的利益放在心上,为民族的解放和国家的建设奉献了毕生精力。”2014年4月4日,在衢江区岭洋乡开展的“缅怀先烈、重温党史”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中,外交部原副部长徐以新之子陆放站在纪念碑前,如是介绍起他的父亲。

当天,陆放和夫人特地赶来拜



徐以新陆红夫妇与孩子在建安

墓祭祖,并接受了专访。他说,在他的眼中,父亲是一个富有革命精神的人,严于律己,平易近人,始终注重理论与实践的结合。

参加革命后 只回家过两次

“我父亲从年轻时离开家后,一生只回来过两次。”陆放说,第一次是新中国成立不久的1951年,另一次是父亲已达82岁高龄的1993年。

“这并不是说他不回老家,而是怕因自己身份给老人家带来特殊待遇。”陆放说,他父亲一生从未要求过给老人家以照顾,1951年回老家时,还是应了爷爷的一个寻人启示。“由于父亲20年外出没回过家门,爷爷思念之情越来越浓烈,于1950年在一家国家级报刊上刊登了寻人启示。父亲看到后,就向周恩来总理请示,并很快得到了批准。令父亲想不到的是,回到家里时,总理已把10万元钱寄给爷爷,爷爷还以为是父亲寄来的。”

1993年回老家时,徐以新已离休,这是他与乡亲们的最后一次见

面,第二年他就去世了。陆放说,父亲其实对老家人是很挂念的,他曾拿出自己的薪资助过20多个老家孩子上学。1993年回来时,还特地品赏了少年时喜欢吃的芋头,并走访慰问了乡里乡亲。

任全国政协常委时 不用秘书专车

1983年至1993年期间,徐以新担任了全国政协常委,按级别,他是应配秘书和专车的。但在陆放的印象里,他父亲没有接受专用秘书、专车配备,每次用车都是由单位临时派遣的,而陆放自己则经常充当起父亲的临时秘书,替父亲打理杂务。

陆放说,为节省开支,他家里没雇保姆,家务都由母亲料理。徐以新虽然生活简朴,但对革命事业格外忠诚,也很大方。在担任驻阿尔巴尼亚大使时,徐以新曾一次性把三年的工资都交了党费。

徐以新也很平易近人,如不是礼节性场合,衣着简洁,从不铺张,而且待人随和,甚至跟小孩都很投缘。

“父亲身教重于言传”

“我们年轻时,父亲经常把他小时候的苦难经历讲给我们听,让我们艰苦朴素,忆苦思甜,时刻想到为人民服务。”陆放说,父亲不仅这样说,而且也是这样做的,身教重于言传,这也成了他们的家风。

由于徐以新担任过12年驻外大使,陆放兄弟姐妹三人长期由陈赓等革命家庭看护。他们曾一度和父母接触很少,每次母亲回来时都行色匆匆,汇报过工作后,又马上离开国内,好多时候都是由陆放兄弟姐妹自己进单位食堂用餐。

陆放说,父亲是个严厉的人,从不惯养孩子,为此在孩子们的心目中,反而觉得陈赓等伯伯们更加亲切,甚至能骑到他们身上去玩耍。

陆放说,父亲在他小的时候没送过什么礼物给他,唯一一次是送给他一本笔记本,上面还写着一句马克思的名言:只有在崎岖险峻、荆棘丛生的小路上攀登的人,才有可能攀上辉煌的顶峰。这让他受益终生。

来源:衢州日报